

城市规模、城市建设 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

贺 辉 王耀中

摘 要: 构建城市规模、城市建设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模型,采用 2003 - 2012 年中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规模、城市建设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对本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影响显著,且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替代;空间效应检验发现,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直接效应显著,但间接效应不明显。

关 键 词: 城市规模; 城市建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5.08.005

一 引言

当今世界已进入到一个服务经济的时代,作为经济的“粘合剂”,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区域或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基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作为服务业发展的一种新形态,构建其集聚高地不仅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地区经济发展层次。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内开始外迁和扩散,其集聚模式由单点的中央商务区(CBD)向多极化、分散化的若干个微型中央商务区(MCBD)发展。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城市功能配套设

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管理水平是提升产业承载能力的主要途径。由此可见,研究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对于实现人口城镇化、城市功能、资源环境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关于城市规模与产业集聚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规模是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产业集聚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成比例提高(秦尊文 2003^①)。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所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是城市存在的原因之一(Smith et al. 2014^②; Berdegué et al. 2015^③),产业的集聚导致了人口的集聚,从

作者简介: 贺辉,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耀中,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4101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JL012);湖南省社科基金基地项目(13JD03);“现代服务业发展与湖南新型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及“湖南省现代服务业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①秦尊文《论城市规模政策与城市规模效益》,《经济问题》2003年第10期。

②Smith M E, Ur J, Feinman G M. “Jane Jacobs’ ‘Cities First’ Model and Archaeological Re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38, no. 4, 2014, pp. 1525 - 1535.

③Berdegué J A, Carriazo F, Jara B, Modrego F. “Cities, Territories, and Inclusive Growth: Unraveling Urban - Rural Linkages in Chile, Colombia, and Mexico”, *World Development*, vol. 73, 2015, pp. 56 - 71.

而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另外,城市规模的扩张又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的集聚,主要是因为当产业向城市集聚时,可以接近销售市场,便于获取市场信息,从而降低销售成本(武俊奎 2012^①)。

城市建设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区位论和新经济地理学证实了基础设施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作用,指出基础设施改善所引起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土地租金、通勤成本以及通达性和网络性的变化会对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学术界对基础设施与产业集聚的经验研究较为丰富,但其结论存在差异。部分学者认为公共基础设施对产业集聚会产生显著的正效应,区域的通达性是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张华和贺灿飞 2007^②; Gibbons et al. 2012^③)。但更多的学者指出,基础设施的集聚效益并非恒定,对不同区域产业集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为主体的区位选择会受到拥挤成本、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郝伟伟和张梅青 2014^④; Crescenzi & Rodríguez-Pose 2012^⑤)。

现有文献对我们深化产业集聚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多数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但较少在同一框架内深入讨论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对其产生的作用,可能带来认识上的偏差。第二,关于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对产业集聚影响的理论研究较少,理论分析不足。第三,已有学者对产业集聚的空间关联性进行了检验,但缺乏对产业集聚空间效应的深入把握。鉴于此,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切入点,构建城市规模、城市建设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技术,实证检验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对其产生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二 理论基础与计量模型设立

(一) 理论分析框架

关于城市规模、城市建设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模型构建,本文借鉴马歇尔集聚经济理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很大程度上也遵循了中间产

品规模经济、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知识溢出的作用机理。假定本地区制造业规模为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供了市场需求,建立如下理论模型:

$$S = \psi M^{\alpha_1} L_s^{\alpha_2} K N_s^{\alpha_3} T^{\alpha_4} \quad (1)$$

其中, S 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 M 表示制造业规模, L_s 和 KN_s 分别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和知识溢出, T 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交易成本,由于城市建设的完善能有效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城市交易成本,故本文选择城市建设水平衡量 T 。

假设城市人口为 POP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k_m 和 k_s ,即:

$$L_m = k_m POP \quad (2)$$

$$L_s = k_s POP \quad (3)$$

由于制造业产品规模与其劳动要素投入密切相关,因此:

$$M = f(L_m) = \gamma k_m POP \quad (4)$$

根据知识溢出理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建设越完善,信息、技术、管理经验等知识在生产性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溢出作用越显著,故:

$$KN_s = \eta POP^{\delta_1} T^{\delta_2} \quad (5)$$

将(2)、(3)、(4)和(5)代入(1)可得:

$$S = \psi (\gamma k_m)^{\alpha_1} k_s^{\alpha_2} \eta^{\alpha_3} POP^{\alpha_1 + \alpha_2 + \delta_1 \alpha_3} T^{\delta_2 \alpha_3 + \alpha_4} \quad (6)$$

令 $\beta_0 = \psi (\gamma k_m)^{\alpha_1} k_s^{\alpha_2} \eta^{\alpha_3}$, $\beta_1 = \alpha_1 + \alpha_2 + \delta_1 \alpha_3$, $\beta_2 = \delta_2 \alpha_3 + \alpha_4$,可得:

$$S = \beta_0 POP^{\beta_1} T^{\beta_2} \quad (7)$$

这说明,一个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与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密切相关。此外,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程度会受到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交互项的影响,故将(7)式扩展为:

$$S = \beta_0 POP^{\beta_1} T^{\beta_2} (POP \times T)^{\beta_3} \quad (8)$$

(二) 计量模型设立

为考察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基于理论分析,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S_{it} = \varphi + \beta_1 LNPOP_{it} + \beta_2 LNT_{it} + \beta_3 LNPOP_{it} \times T_{it} + \bet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9)$$

①武俊奎《城市规模、结构与碳排放》,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年。

②张华、贺灿飞《区位优势性与在京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地理研究》2007 年第 5 期。

③Gibbons S, Lyytikäinen T, Overman H G. “New road infrastructure: the effects on firm”, *SERC Discussion Papers*, SERCDP117. *Spatial Economics Research Centre (SERC)*,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UK. 2012.

④郝伟伟、张梅青《北京市产业布局与交通系统互动协调发展分析》,《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 期。

⑤Crescenzi R & Rodríguez-Pose A.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growth in the European Union”,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Vol. 91, no. 3, 2012, pp. 487 – 513.

其中, i 和 t 分别表示 i 地区 t 时期的数据, S_{it} 为 i 地区 t 时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 POP_{it} 和 T_{it} 分别为 i 地区 t 时期的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 X_{it} 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ε_{it} 是随机误差项。

为厘清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及其他解释变量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影响作用,参考 Anderson et al. (2009) ①、潘文卿 (2012) ②、张浩然 (2012) ③等学者的研究方法,本文建立如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S_{it} = \rho \sum_{j=1}^N w_{ij} S_{jt} + x_{it} \beta + \sum_{j=1}^N w_{ij} x_{jt} \gamma + \alpha_i + \n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0)$$

其中, x_{it} 为解释变量集合, ρ 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W 的元素, α_i 、 ν_t 和 ε_{it} 分别表示地区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干扰项。

为完整体现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采用空间反距离权重矩阵,即:

$$w_{ij} = \begin{cases} 1/d_{ij} & i \neq j \\ 0 & i = j \end{cases} \quad (11)$$

三 变量及数据

(一) 变量选取

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 (S): 利用区位熵 $S_{it} = (L_i^s / \sum_{j=1}^k L_{ij}^s) / (L^s / \sum_{i=1}^n \sum_{j=1}^k L_{ij}^s)$ 来衡量,若 S_{it} 大于 1,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在该城市总就业中所占比重大于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的份额,生产性服务业在该城市的地方专业化程度高;反之,若 S_{it} 小于 1,则生产性服务业在 i 城市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关于生产性服务业所包含的细分行业,借鉴 Grubler 和 Walker 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将其定义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业。

2. 城市规模 (POP): 城市规模包括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三方面。经济规模是指城市中聚集的物质与经济要素的数量,人口规模即城市人口数量,用地规模为城市建成区的土地面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相近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

的经济规模、用地规模与人口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城市人口越多,经济规模就越大,占地就越多,因此,本文采用城市人口规模进行衡量。

3. 城市建设 (T): 以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密度进行度量,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从形成公共资本至转化为实物设施,存在一定的建设周期,因此,本文选用滞后一年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作为本期基础设施水平的测度。由于无法从公开的统计年鉴中获得不同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密度,因此首先借鉴柯善咨、赵玉奇等 (2014) ④的方法,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由城市集中供热、供水、燃气、道路桥梁、公共交通、防洪、排水等投资组成,然后利用永续盘存法对不同城市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进行测算,即 $T_{it} = (1 - \delta) T_{it-1} + I_{it-1} / d_{it-1}$,其中折旧率 δ 为 5%, I_{it-1} 为实际投资, d_{it-1} 为各地区的累计资本价格指数,最后除以城市的建成区面积。

4. 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的交互项 ($POP * T$): 构建一组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的交叉项,以检验城市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是否会受城市建设的影响。

借鉴已有文献,其他的解释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 (FDI)、财政支出规模 ($FISC$)、经济发展水平 ($AGDP$) 和人力资本 (EDU)。

(二)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2003 - 2012 年中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城市市区,因此本文采用的统计数据均以市辖区为样本。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空间相关性检验

通过测度 2003 - 2012 年中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的 Moran 指数可知,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城市层面上,中国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非随机,而是存在空间上的依赖性。

①Anderson R, Quigley J M, Wilhelmsson M. "Urbanization,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Inve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66, no. 1, 2009, pp. 2 - 15.

②潘文卿《中国的区域关联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③张浩然《地理距离、集聚外部性与劳动生产率——基于城市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南方经济》2012 年第 2 期。

④柯善咨、赵玉奇、王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中国土地科学》2014 年第 2 期。

Moran 指数从全局刻画了中国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自相关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 LISA 指标检验中国城市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建设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局域空间关联效应,即检验局部地区是否存在高值或者低值的聚集。从图 1 和图 2 不难发现,2012 年,中国城市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高值区域集中在东部的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带,低值区域集中在西部地区;城市建设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高值区域也是集中在东部地区,覆盖了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城市。这说明,集聚区域之间已经相互连接成形,中国城市规模、城市建设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都存在局域空间关联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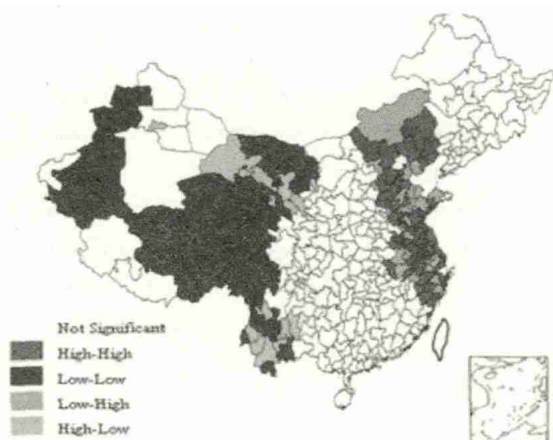


图 1 2012 年中国城市规模
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LISA 聚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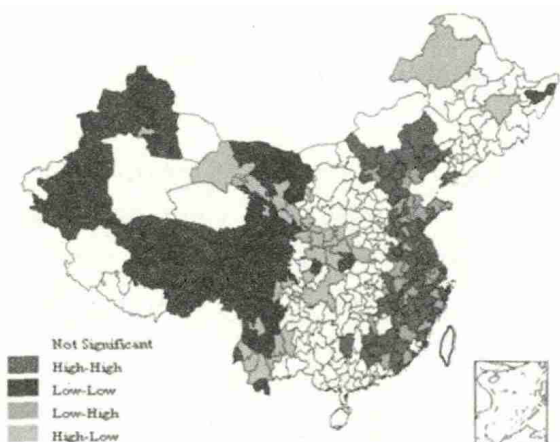


图 2 2012 年中国城市建设
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LISA 聚类图

(二)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 1 的回归结果可知,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

宾模型较为合理,考虑到空间滞后因变量和自变量对偏差校正过程相当敏感,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偏差修正双向固定效应杜宾模型。同时,本地区城市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增多、人力资本愈加丰富,这为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进而带动一批与生产性服务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本地区形成空间集聚,以此获得强劲的竞争优势。此外,本地区城市建设的影响系数也显著为正,完善的城市建设有助于淘汰落后的产能、改善城市的空间布局,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环保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设施、文化体育设施和商贸综合设施的建设,促进城市经济向产业集群升级,并推进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式发展。值得指出的是,本地区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的交互项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这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市政建设滞后有关,尽管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城市规划不足、公共设施建设滞后,致使城市整体功能无法提升,不能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示范和辐射作用,难以吸引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在其他影响因素中,本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为负,但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本地区外资规模不能有效地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本地区财政支出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与我国财政扶持政策有关。为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步伐,各级财政部门提高了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大了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的投入,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推动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本地区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尽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非能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本地区人力资本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生产性服务业最主要的“投入”就是人力资本,高素质人才的增加有助于整合生产性服务业各种资源,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高地的形成。

(三) 空间效应解析

由于模型引入了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除了本地区解释变量对其被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外,还包括城市间的空间间接效应。Elhorst (2012)^① 研究指出,SDM 的空间滞后系数无法完全准确解释空

①Elhorst J. “Matlab software for spatial panel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vol. 35, no. 4, 2012, pp. 1-17.

间溢出效应,分析空间溢出效应需要进一步对间接效应进行判断。为此,在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基础上,通过偏微分方程将各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进行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Spatial and time – period fixed effects		Spatial and time – period fixed effects bias – corrected		Random spatial effects , fixed time – period effects	
变量名称	估计值	t 值	估计值	t 值	估计值	t 值
LNPOP	0.3306***	17.0198	0.3303***	16.0272	0.3103***	15.8162
LNT	0.2921***	9.2774	0.2917***	8.7319	0.2852***	10.3882
LNPOP* T	-0.2898***	-9.5762	-0.2893***	-9.0066	-0.2643***	-11.0684
LNFDI	-0.0442	-0.7638	-0.0454	-0.7397	-0.0689	-1.1384
LNFISC	0.100*	1.7604	0.1012*	1.6674	0.1112*	1.8652
LNAGDP	-0.0096	-0.7070	-0.0097	-0.6708	-0.0498***	-3.9038
LNEDU	0.0307**	2.2250	0.0309**	2.1085	0.0305**	2.4298
W* LNPOP	0.0354	0.1135	-0.0267	-0.0809	0.1198	0.3845
W* LNT	0.0618	0.1328	0.0040	0.0081	0.2979	0.7517
W* LNPOP* T	-0.2515	-0.5540	-0.1864	-0.3875	-0.3901	-1.1484
W* LNFDI	2.2896***	4.9002	2.1520***	4.3740	2.3085***	4.8922
W* LNFISC	-0.6263	-0.8664	-0.6176	-0.8052	-0.4727	-0.6401
W* LNAGDP	0.0638	0.3901	0.0602	0.3471	0.0482	0.3778
W* LNEDU	-0.3194	-1.3605	-0.3165	-1.2706	-0.4569**	-2.1557
ρ	0.6340***	8.1625	0.7818***	16.0157	0.6260***	7.9184
teta					0.1383***	16.9771
R2	0.8850		0.8852		0.8696	
LogL	2315.01		2315.01		165.41	
Wald(lag)	39.84***		31.82***		47.55***	
LR(lag)	38.07***		38.07***			
Wald(error)	45.49***		37.22***		50.47***	
LR(error)	44.17***		44.17***			
Husman					98.6614***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统计显著。

从直接效应来看,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直接效应最显著,说明目前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动力为人口扩张和城市建设,人口向城市转移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城市建设投入的增加有效提升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承载力和要素集聚能力。而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交互项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这和本地区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未跟上人口扩张的步伐,城市长远发展与城市规划有待加强。此外,人力资本的直接效应也较显著为正,专业化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的前提条件,它所带来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区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值得指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显著性不强,说明本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有效地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

从间接效应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间接效应最强,显示了临近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影响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虽表现为正向间接效应,但不显著;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交互项、财政支出规模和人力资本的负向间接效应也不显著,这反映了本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未能有效承接临近地区城市规模、城市建设等的溢出与辐射作用。

表2 空间效应检验

模型	变量名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估计值	t 值	估计值	t 值	估计值	t 值
Spatial and time – period fixed effects	LNPOP	0.3323***	17.1577	0.6769	0.7091	1.0091	1.0528
	LNT	0.2937***	9.5008	0.6838	0.5040	0.9775	0.7175
	LNPOP* T	-0.2936***	-9.7876	-1.2083	-0.8926	-1.5019	-1.1049
	LNFDI	-0.0225	-0.3850	6.3886***	3.4840	6.3660***	3.4684
	LNFISC	0.0949	1.5726	-1.6737	-0.8266	-1.5788	-0.7793
	LNAGDP	-0.0089	-0.6569	0.17598	0.3921	0.1671	0.3730
	LNEDU	0.0285*	1.9536	-0.8535	-1.1824	-0.8251	-1.1360
模型	变量名称	直接效应	t 值	估计值	t 值	估计值	t 值
Spatial and time – period fixed effects bias – corrected	LNPOP	0.3343***	15.7492	1.1686	0.6302	1.5029	0.8080
	LNT	0.2955***	8.7359	1.2468	0.4770	1.5423	0.5883
	LNPOP* T	-0.2959***	-9.0090	-2.1321	-0.8216	-2.4280	-0.9324
	LNFDI	-0.0084	-0.1328	10.1387***	2.8458	10.1303***	2.8396
	LNFISC	0.0924	1.5117	-2.5676	-0.6470	-2.4752	-0.6220
	LNAGDP	-0.0086	-0.5914	0.2544	0.2859	0.2458	0.2759
	LNEDU	0.0255*	1.6573	-1.3903	-1.0709	-1.3647	-1.0460
模型	变量名称	直接效应	t 值	估计值	t 值	估计值	t 值
Random spatial effects , fixed time – period effects	LNPOP	0.3120***	15.2450	0.8987	0.8331	1.2107	1.1184
	LNT	0.2890***	9.9916	1.3478	0.9273	1.6368	1.1229
	LNPOP* T	-0.2691***	-10.6902	-1.5676	-1.1010	-1.8367	-1.2867
	LNFDI	-0.0452	-0.7547	6.3532**	2.2746	6.3080**	2.2542
	LNFISC	0.1080*	1.8436	-1.1896	-0.5554	-1.0816	-0.5048
	LNAGDP	-0.0498***	-3.9264	0.0297	0.0675	-0.0201	-0.0456
	LNEDU	0.0269**	2.1050	-1.2521	-1.3005	-1.2252	-1.2667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城市规模、城市建设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模型,选取2003–2012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规模、城市建设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显著,空间计量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和城市建设对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交互项的影响系数却显著为负。同时,空间效应检验发现,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及交互项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直接效应显著,但间接效应不明显。

基于此,本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提出以下思考:

首先,优化城市规模。根据最优规模的思想,将城市规模的大小、区位、发展潜力进行评估和归类,选择性确定重点扩容城市,重点发展一批有潜力的中等城市成为大城市,提高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带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其次,加强城市建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础是人口城市化,为防止人口过度集聚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应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和信息平台建设,构建集信息、研发、金融、物流、培训、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吸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质量。

再次,促进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综合考虑城市发展速度和环境容纳能力,科学规划城市规模;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布局,促进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同步发展。

最后,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针对不同规模城市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特大型城市应利用好自身信息、人才的集聚优势,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高地;大城市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中小城市依据自身特色和本地化特征,带动与之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责任编辑:李建华)